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 改革开放: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

张 明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如何在理论上对当代中国最伟大实践所取得的丰富中国经验进行阐释、指导,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所谓中国经验, 就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所继承与积累的宝贵经验; 所谓中国理论, 就是关于中国道路的逻辑表达, 亦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 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sup>①</sup> 在解读新中国 70 年来、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需要“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sup>②</sup>。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不仅体现在推动物质生产力跃迁的层面, 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而且也体现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思想层面, 即立足于改革开放所继承与积累的丰富中国经验, 当代中国在求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理论建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改革开放之所以不断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sup>③</sup> 立足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丰富中国经验基础上, 不断推动中国理论的创新性建构,

构成了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变迁的一个丰富理论横断面。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重要变迁, 既勾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线, 也为从更加宽广维度出发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更是对改革开放 40 余年历史完整深刻的认识。

###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经验的历史性生成

理论产生不是单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思辨或逻辑演绎的过程, 它从根本上是立足实践基础上的总结与提升。中国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 它是深刻根植于中国实践基础上的逻辑产物。在中国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经验, 是中国理论生产的直接质料, 中国经验的丰富性是保障中国理论源源不断生成的基础。这里所言的中国经验, 不单纯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 而且也应当包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经验,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包含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有机统一体。之所以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性经验也涵盖进去, 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从根本上相对立, 二者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阶段, 后者是对前者的继

\*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研究”(18JJD71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第 8 页。

② 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求是》2019 年第 8 期。

③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

承、创新与发展，但都从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历史。科学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不单纯是一个理论上的学术问题，而且更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政治问题。<sup>①</sup>

当然，推动中国理论的建构与丰富，更为重要的应当是从当前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出发。改革开放形成了丰富的系统化、整体性复合型经验，为中国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特征就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这种剧烈变动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提升等现实维度，而且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条条框框，极大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变革。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是立体丰富的多元复合型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就推动中国理论创新与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丰富中国经验，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其中诸多理论与实践都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甚至是经典作家从未提出的新观点、新判断。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否定，而是在坚持基本原理基础上所做的突破与创新。坚持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当代语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究竟应当坚持什么？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②</sup>，不能走向具体结论上的拜物教。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原则，即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进行补充、修葺与完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所言“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

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是指方法。”<sup>③</sup>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价值与意义，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产生动摇与质疑。最后，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开放的理论，对待科学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sup>④</sup>。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与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之间存在着质性差别，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作为内在逻辑支撑，只有不断直面当代现实实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求解现实问题中发展经典理论，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如果固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结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从根本上不可能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可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21 世纪中国的突破性发展。

（二）立足中国国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从书本出发、寻求理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并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成答案<sup>⑤</sup>；二是从既有经验出发，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当时中国可供唯一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是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的产物，并不能直接回答中国实践中提出的具体问题。立足中国国情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科学回答何谓中国国情？从纵向层面看，中国国情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活动所组成的综合规定性。以往在理解中国国情时，往往从当下中国实践出发，而忽

① 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3—1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76 页。

③ (匈) 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 《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47—48 页。

④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6 页。

⑤ 刘林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纪元》，《毛泽东研究》2019 年第 2 期。

视了既往实践以及历史因素对于当下的影响。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每一时代都是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即上一代所留下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等因素<sup>①</sup>。“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sup>②</sup>，历史性因素有其相对独立性，会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对当下实践发挥着特定影响。从横向层面看，中国国情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所组成的综合统一体。以往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往往侧重从经济因素出发看国情，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对于国情的综合规定。以文化因素为例，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发挥自身相对独立性作用，即通过对实践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塑而产生其特定影响。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基本国情究竟为何？毛泽东时代曾用“一穷二白”来概括当时国情，即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sup>③</sup>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于基本国情是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阐释，已经逐步接近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规定。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认识“一穷二白”时却走向了误区，即过分夸大落后的所谓“优势”与主体的能动性，进而导致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重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当前已经是社会主义，而非其他主义；其次，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规定了主要工作重心应当是经济建设；最后，应当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正确处理初级阶段“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三）从自觉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出发，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考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核心问题。纵观现实层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无论是苏东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都未能从根本上回答好这一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sup>④</sup>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探索性实践，尤其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充分吸收总结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丰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诸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拒绝照搬照抄他国模式的拿来主义；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属性；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理论；对党的建设规律、发展规律等方面认识不断深化拓展，等等。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有了新的发展，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sup>⑤</sup>。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摸索，“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sup>⑥</sup>。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建构与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从人类现代化“中国方案”的高度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把握了世界主题——和平与发展，以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动姿态拥抱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经过40余年积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
  -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 ⑤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 ⑥ 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14页。

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当今中国的伟大实践，并非是在中国本民族单一地域内进行的孤立探索，而是以更加紧密的姿态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相结合；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面临并不断致力于解决的诸多问题，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亟待求解的普遍性问题，诸如经济问题、生态问题，等等。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复杂性、深层次性，决定了仅仅依靠西方思维逻辑和单一国家力量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作为世界普遍性问题的一个缩影，不能通过中国单一国家就可以得到解决，同时世界发展的诸多问题的求解也离不开中国的努力参与。因而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衡量世界发展的一个丰富横断面。以人类走向现代化路径这一普遍性问题为例，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探索性实践，为求解这一问题做出了符合自身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西方现代化理论预设了一元排他性的价值导向，认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只可能存在西方模式的唯一可能性。面对西式现代化话语霸权与强势操控，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在求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深刻矛盾<sup>①</sup>。中国通过自身的独立自主性探索，在书写符合自己实际的现代化话语与道路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表率。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方案，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样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模式，而是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与时代特色的多样可能性选择。

##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理论的逻辑建构

改革开放的探索性实践不仅改造了现实，而且也创新了理论，即结合不断变动的实践以不断创造新概念、建构新理论。改革开放的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造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的复杂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既符合理论话语创新的一般规律，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基本形式，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特殊实际。改革开放是在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步入困境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实践。邓小平曾用“书本上没有的”<sup>②</sup>，来概括改革开放的探索性与开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话语的相对供给不足，尽管对后世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即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中国实际、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深刻凸显开拓性特征，内在预设了中国理论创新的丰富可能性空间。

就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资源库的构成因素而言，主要是长期在革命年代所形成的革命理论。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因为一系列复杂因素的限制，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正是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的曲折与困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担当，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做出了重大改革与突破。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相对不足，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出的具体结论，也没有抽象地建构出一整套理论体系来指导实践，而是率先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逐步在实践中创造出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诸如，面对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定型表述；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点的特殊性问题，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全新理论；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偶性”设定与绝对对立，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等等。上述全新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是结合中

<sup>①</sup>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

国实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突破与革新。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言,不能寄希望马克思、列宁为后世提供求解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现成答案,“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这里所言的“新的思想、观点”,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革新与突破性发展,而这些新理论之所以能够不断生成,关键在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走在了既定理论的前面——实践先于理论,全新的探索性实践不断需要理论层面的跟进、规范与阐释。

从理论创新的层面而言,作为“进行时”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理论丰富与发展的核心,集中体现在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条件下,如何建设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代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新塑造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拘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使命,并未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做出详尽阐释。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一个现实形态,苏联模式在关于社会主义动力问题上也表现出语焉不详、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论困境——从教科书体系规定的苏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社会各阶层政治上的一致性与爱国主义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到后来尽管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矛盾,但并未将其视为基本矛盾。中国改革开放在继承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基础之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明确将矛盾视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依此逻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自我革命,才能不断求解现实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步入新的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就是不断解决旧矛盾,迎接新矛盾,再解决新矛盾的无止境过程,赋予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邓小平所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sup>②</sup>只有重塑社会主义矛盾动力观,改

革开放才具有理论与现实上的可能性,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寻找到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显性标识就是关于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③</sup>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及时有效地调整实践方向与政策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是重新锚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资源库中,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性产物与对偶而存在的,二者处于非此即彼的截然对立关系之中。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历史发展的上升期,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而没有成为现实。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那里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其表现为一种前后的相互替代关系,而非相互并列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结合历史与时代发展的最新特点,尤其是在“和平发展主题论”的指导下,重新锚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做出了结合时代特征的新突破,即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相互学习的历史图景中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照,深刻证明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sup>④</sup>。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中学习其先进技术与管理水平,在推动中国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赢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与更合理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构成了改革开放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重新规划。因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③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论的当代发展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全球化时代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历史方位问题。

三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主要是从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加以展开的，即从构成社会主义的若干静态因素出发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如生产关系层面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运行方式层面纯之又纯的计划经济以及分配方式层面纯之又纯的按劳分配等结构性要素。以往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从静态结构层面出发的。这种追求纯之又纯的结构因素的做法，更多地是注重生产关系层面的调节，而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限制，反而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建构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恰当的辩证张力关系格局，更多地注重建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开始逐步由静态结构转向动态的功能，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②</sup>。为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做出了契合实际的调整与革新，如所有制层面打破公有制的单一性，建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经济运行方式层面实现消解了原先赋予计划与市场之上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从发展经济的手段层面理解二者的本质，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方式层面引入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形式。

四是重新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命运。如前所言，改革开放重新锚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确立了长期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这一新的

历史方位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逐渐突破经典作家当时的理论设想——在天然隔绝的环境下与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斗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在诸多方面已经以合题的方式加以出现。加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高度出发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从当代中国实践出发求解世界性普遍难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命运的重要特征。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将自身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命运相挂钩，从更加长远的视角和更加宽阔的维度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倡议。基于全球人类利益考量之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在新时代为人类发展普遍问题发挥大国贡献、提供中国方案的责任担当。可以说，当前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将自身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命运提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使得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超越了本土性实践经验，从而提升到更为宽广的普遍性价值维度；同样，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也将人类普遍性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相关联，推动通过“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为丰富发展人类普遍性实践提供了“中国方案”的可能性维度。

### 三、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理论的发展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方位<sup>③</sup>。如果以“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关键词来衡量新时代历史方位的话，一方面，改革进入全面深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③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

化阶段，期间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矛盾与利益藩篱，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完，只剩下“硬骨头”；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开国门，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境遇都将呈现重大的转变，这些新情况与新特点已经完全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理论想象。面对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必须要在理论上不断跟进时代的步伐，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新、建构新的理论话语，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理论上做出新的突破与发展，不断充实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建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理论做出了难能可贵的重大贡献。诸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判断，本身就是密切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特征基础上做出的话语创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话语形式与内容的不断创新——“中国梦”“新常态”等，为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当下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当代中国所进行的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sup>①</sup>，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必然会催生大量理论的创新性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的理论结晶，是立足于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科学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sup>②</sup>。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于，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与实践特征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当然，必须要看到的是，当前在进一步推

动中国理论的建构问题上，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sup>③</sup>上述问题与挑战从另一种维度来看，恰恰为当下中国理论的批判性建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进一步推动中国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需要紧密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在不断求解现实重大问题的探索之中加以丰富。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sup>④</sup>。现阶段，要花大力气回答如下两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是从进一步改革的层面而言，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以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因为主客观原因所限，更多地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加以展开的，但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实践经验的积累与理论准备，当前关于中国理论的建构应当从尝试性、分散性的探索上升到前瞻性、整体性的理论创制，即从“摸着石头过河”上升到“顶层设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并非仅仅是从当下实践出发展开理论思考，而应当做出具有长远性、前瞻性的理论规划，这种理论上的规划需要被置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长时段坐标之中加以审视，是衔接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过去—现在—未来”的理论中介。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元互动的复杂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世界发展潮流出发加以综合把握，在理论上展开探索性思考。

①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③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

④ 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14页。

做好关于中国理论建构的“顶层设计”，需要重点回答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正确回答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关于新时代改革方向与目标的“顶层设计”，最为核心的问题应当是正确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化”问题<sup>①</sup>，尤其是回答如何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另一方面，正确回答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凝聚最广泛的改革共识问题。经过40余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利益调整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利益格局的藩篱，改革在向纵深挺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共识不足的困难。在此背景下，需要从理论上重点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打造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进一步“做大蛋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即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导，动员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着力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切实问题，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是从进一步开放的层面而言，需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当前尽管全球化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主流，但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正逐渐抬头，对中国推动对外开放与加快自身发展产生了严峻挑战。改革开放之初设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外部定位——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相互竞争，正面临着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峻的战略压力。这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其实鲜明折射出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实力在改革开放中的稳步提升，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日益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压制。如何在复杂多变

的国际关系中正确定位当代中国对外发展的航向，这是未来中国理论所必须要着力回答的重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集中聚焦两大问题。一方面是全面认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问题。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尤其是中国大国崛起面临来自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压制下，需要高度重视独立自主的精神，立足自我，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与提升，自觉规避简单拿来主义、全盘依附西方的理论与实践误区，建构以自我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需要以更加远大的战略规划与更加多元灵活的方式化解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复杂问题。不能因为对外发展环境的部分变化，而退回到封闭保守的时代，而是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构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相交融。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世界发展，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凝聚更加广泛的国际共识，以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良好外部环境的历史性建构。

概言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命运，而且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命运，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中国理论在这样一个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伟大时代，必将在未来的实践中创造出更为璀璨的理论光芒。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 薛 承）

<sup>①</sup>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3页。